

冯剑辉◎著

T-779.08
P

近代 徽商 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近代徽商研究

JinDai HuiShang YanJiu

冯剑辉/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徽商研究/冯剑辉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1093-980-5

I. 近… II. 冯… III. 商业史—研究—安徽省—近代 IV. F7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0309 号

近代徽商研究

冯剑辉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49 千字
印 刷 合肥工业大学印刷厂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980-5

定价:2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一、徽商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1)
二、徽商研究中的主要学术问题	(4)
三、徽商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15)
四、当前徽商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	(18)
五、本书的撰述旨趣	(21)
第一章 从明清徽商到近代徽商	(24)
一、徽州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24)
二、明清徽商的崛起	(27)
三、近代徽商：在劫难中衰变	(33)
第二章 近代徽商“解体”辩	(40)
一、近代徽州商人群体的扩大	(40)
二、近代徽州经商风气浓厚的原因	(44)
三、近代徽州商帮依然存在	(50)
第三章 近代徽州茶商述评	(52)
一、茶业在近代徽州中的地位——“人民命脉所寄”	(52)
二、近代徽州茶业发展概况	(54)
三、近代徽州茶业经营的特点	(66)
四、若干近代徽州茶商个案	(71)
第四章 近代徽商在传统行业中的经营	(76)
一、盐业——近代徽州盐商的回光返照	(76)
二、近代徽州木商的发展	(81)
三、近代徽州典商述评	(87)
四、其他传统行业	(94)

第五章 近代徽商转型述评·····	(100)
一、近代徽商“落后”辩·····	(100)
二、近代徽商转型的象征——买办阶层的出现·····	(103)
三、近代徽商买办的历史作用与评价·····	(105)
四、危机与新生——近代徽商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经营·····	(112)
第六章 近代徽商与徽州社会变迁·····	(119)
一、近代徽商与传统士绅地位的更替·····	(119)
二、徽州绅商与清末社会变迁·····	(121)
三、近代徽商与教育事业变迁·····	(125)
四、近代徽商与公益事业变迁——以屯溪公济局为中心·····	(129)
五、近代徽商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以徽河抗捐案为中心·····	(132)
六、近代徽商与徽州社会风俗变迁·····	(135)
第七章 近代徽商网络研究——以上海同乡组织为中心·····	(140)
一、近代徽商网络中心的转移：扬州—上海·····	(140)
二、以同乡组织为中心的上海徽商网络·····	(144)
三、上海徽商同乡组织研究——以徽宁思恭堂为中心·····	(149)
第八章 近代徽商家族的复兴——以婺源江湾萧江为中心·····	(157)
一、婺源江湾萧江：一个历史悠久的徽商家族·····	(157)
二、江湾萧江近代转型的历史环境·····	(161)
三、江湾近代徽商子弟——江谦与江导岷·····	(164)
四、江导岷与通海垦牧公司·····	(166)
五、江谦与通州师范学校·····	(172)
六、近代徽商的传统情结：江谦与江导岷的乡族情谊·····	(177)
七、近代江湾萧江的复兴——以永思堂的重建为中心·····	(179)
结 论·····	(188)
参考文献·····	(191)
致 谢·····	(199)

导 言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强大的商帮，在商界称雄三百年，势力达到高峰时，“全国金融几可操纵”^①，成为社会一大奇观。此种重大的历史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目，因而对徽商的品评早在明清时期就开始了，明清小说《拍案惊奇》、《儒林外史》中就有一大批徽商人物的形象。然而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徽商研究，则始于20世纪40年代。经过学术界六十多年的努力，今天徽商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学术殿堂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以徽商研究为重要内容的徽学更成了一门显学，发展十分迅速。

一、徽商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厦门大学傅衣凌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徽商研究的学术开创者。他在1947年发表《明代徽商考》^②一文，确认徽商是明代活跃的商帮之一，对徽州人出贾众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口压力和封建剥削是主要原因。傅先生对徽商较为集中、影响较大的十二类行业进行了分别论述，对徽商雄飞于明代商界的原因作了初步分析，认为徽商兼营金融业、重视商业道德、勤劳节俭。更值得注意的是傅衣凌先生对徽商资本形成和出路的分析。他指出，徽商资本在分解封建社会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具有不少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但又被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一方面受着古旧的老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的压迫，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所苦，死者捉住生者，形成了徽商资本的一个基本特

①（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

② 载于《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1947年第2期，又载于《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又载于《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点”^①。傅先生的论文，涉及徽商研究的诸多层面，其中的精彩之处，即使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而在当时内战连绵不断的环境中，傅先生能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敏感和治学精神，宣告了现代学术意义上徽商研究的开端。

进一步使徽商研究成为一个重要学术论题的是日本学者藤井宏，他发现晚明歙县汪道昆的《太函集》“乃是有关徽州商人史料之宝藏，为之狂喜”^②（按：前引傅衣凌先生论文已经注意到《太函集》的重要性了）。他以《太函集》提供的大量珍贵史料作为骨架，开创了立体的、结构严密的徽商研究道路。1953—1954年间，《东洋学报》第36卷第1~4期上连载了他10万余字的长篇论文《新安商人的研究》，全文分序言、明末清初物资流通的一般情况、新安商人的活动范围与营业项目、商业资本的蓄积经营的诸形态、新安商人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接触面、新安商人与国家及官僚的关系、结论，共七个部分。这一长篇论文奠定了现代徽商研究的基础，成为研究徽商、治徽学者的必读资料。虽然对文中若干资料的引用和具体结论，不时有学者进行商榷，但从总体上来说，藤井宏先生的论文在徽商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学术界在徽商研究中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首先得益于藤井先生的开创之功。

1950年后，随着中国大陆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过去保存在徽商家族和祠堂里的大量契约文书流入社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徽州文书跨越从南宋至民国的千余年的长时段，涵盖徽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商业契约在内的超过30万件的徽州文书，为徽商和徽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术宝库，学术界将其誉为继敦煌文书、甲骨文、汉简、金文之后的第五大发现。傅衣凌先生继续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工作，以地方志书为重点，收集整理成《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③这实际上是以徽州婺源县商人中心的一篇论文，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料汇编。在当时中日尚无邦交的情况下，傅先生经过艰苦努力，获得了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全文，与黄宗焕先生共同将其翻译为中文发表出来，国内学者亦有撰文对藤井氏观点进行商榷的，^④开中外徽商研究学术交流之先河。至“文革”前，中国大陆关于徽商研究的专门论文虽不甚多，但在研究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若干论文中有不少关注到徽

①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②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③ 载于《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

④ 陈野：《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试以徽州一地为例来论证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问题》，《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5期。

商并进行过若干探索,^①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灾难性的冲击,中国大陆的徽商研究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徽商研究则取得了较多的进展,日本学者斯波信义对徽州地域开发历程的研究^②,重田德对徽州商人的研究^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台湾学者方豪依据其在战乱中所获得的若干徽州文书资料,发表了关于徽商和徽州社会经济研究的系列论文,^④在运用徽州文书进行徽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开创了新的学术风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学术环境的巨大变化,徽商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出现了全面发展的繁荣局面。依据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所编《徽学研究论文总目》等工具书进行的不完全统计,1978—2006年间,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的徽商研究论文数量在500篇以上,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数字。就著述而言,中山大学叶显恩教授,在总结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⑤,为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徽州明清社会的专著,除正史、地方志、诗文集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宗族谱牒和田野调查资料,成为徽商和徽学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有学者誉其为“徽学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⑥。由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⑦一书的出版,为徽商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方便。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曾多次召开包括境外学者参加的徽学研究学术会议,在安徽省、黄山市和若干高等院校的学术机构内建立了专门的徽学研究机构,一批术业有专攻的学者脱颖而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学术队伍。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教授所著《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⑧、《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⑨,安徽大学卞利教授所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旅日学者早稻田大学熊远报副教授所著《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界・集团・ネットワークと社会

① 参见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江海学刊》1962年第11期。

② (日)斯波信义:《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东洋史论丛》1972年第1卷。

③ (日)重田德:《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417~456页。

④ 方豪:《乾隆五十五年自休宁至北京旅行用账》,《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7期;《明万历年间富家产业抄》,《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5期;《乾隆十一年至十八年杂账及嫁装账》,《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1期;《康熙时重新祠楼之文献》,《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1期;《乾隆二十六年等赴六合事录》,《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7期。

⑤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 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⑦ 黄山书社1985年版。

⑧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⑨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秩序》^①，周晓光、李琳琦合著的《徽商与经营文化》^②，李琳琦所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③，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徽学和徽商研究的领先水平。由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张海鹏、王廷元、王世华、周晓光、李琳琦等学者主编的《徽商研究》^④，在总结既往徽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大量新发现的资料进行了新的探讨。1999年国家重点社科基金项目“徽州文化全书”开始启动，该书包括20部专著，作者皆为目前国内知名学者，总字数在600万字以上，其中第二部是由王廷元、王世华主编的《徽商》^⑤，内容非常丰富，是对徽商研究的又一次全面的总结。

二、徽商研究中的主要学术问题

时至今日，徽商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不同观点的争鸣如繁星闪烁，令人目不暇接，对其中较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可作一归纳。^⑥

（一）徽商的兴起

1. 徽商兴起的年代

徽商盛于明清为不争之事实，但起源于何时？众说纷纭，主要的观点有如下几种：

（1）晋代。叶显恩先生认为是在东晋时期，当时具有营商传统的北方世家大族为避乱纷纷南渡，进入徽州后兼营商业，他引《晋书》卷二十八的史料，司马晞未败时，“讌会辄令娼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显见当时徽州人经商的离别情意已经写入歌谣，其经商活动已经为时人所知。^⑦李则纲^⑧、汪绍铨^⑨也持同样观点。

（2）宋代。这是由傅衣凌先生最早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宋代徽州茶商已相当活跃，南宋当地有制造和使用大量纸币（会子）的记载，可见当时徽州已

① 汲古书院2004年版。

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③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 王世华：《徽商研究：回顾与前瞻》（刊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对徽商研究中的学术问题作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价值很高，本文对徽商研究中的学术问题进行归纳时，参考并引用了王教授的论文，特此注明。

⑦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和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100页。

⑧ 李则纲：《徽商述略》，《江淮论坛》1982年第1期。

⑨ 汪绍铨：《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5年第2期。

成为商业中心,并有大商人出现。^①藤井宏也同意徽商的起源可以溯及宋代^②。刘和惠则认为徽商之称起于明代,不能把徽商简单地理解为徽州商人,历史上的徽州商人并不都等于徽商,作为学术研究的徽商有其特定的含义。在经过对历史的纵向考察后,刘和惠认为,徽商肇始于南宋后期,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期,盛于明嘉靖以后至清康熙时期^③。尽管刘先生认为傅衣凌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从他的结论来看,实际上是徽商起源宋代的又一说。

(3) 明代。张海鹏和王廷元同样认为徽商应该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而不是泛指个别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应该是一个商帮的称号。徽人经商的历史固然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是徽商的历史则应该是从明中叶开始。徽州商帮的形成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到明代中叶才具备。^④

2. 徽商兴起的原因

大多数人都同意徽商兴起是由多方面综合因素决定的,这包括:(1)徽州山多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因而不得不商贾他乡,求食四方;(2)徽州境内有一定的水路交通,方便经商;(3)徽州地处经济发达地区附近,尤其是宋室南迁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兴起创造了条件;(4)徽州有竹木等自然资源,为徽商互通有无提供了物质基础;(5)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

王珍对上述意见作了若干补充:一是徽民素称勤劳,不辞山高路远。二是经商方式多样:走贩(长途贩运);囤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开张(广设典肆,开展竞争);质剂(经营典铺);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三是经营项目广泛,除盐典茶木外,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茶馆、钱庄,以及南北杂货、京广百货等。四是资本筹措和运用灵活。五是徽人宗族、同乡观念重,结成徽帮,有利竞争。^⑤

唐力行突出强调宗族势力在徽商形成和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徽商依托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组成徽州商帮。^⑥

①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②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

③ 刘和惠:《徽商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④ 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⑤ 王珍:《关于徽商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徽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⑥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二）徽商的资本积累

对徽商的资本积累以日本学者的考察最为详细，国内学者也有若干补充。

藤井宏对徽商资本积累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认为徽商的原始资本是通过7种形式形成的：（1）共同资本，即若干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的形态；（2）委托资本，即由资本者授予商人资金，直接委托其经商；（3）婚姻资本，即借婚姻关系由妻家直接提供资本和以妻家的嫁妆转化为商业资本；（4）援助资本，即依靠亲戚、同乡、同族、好友等富裕者的援助或贷予资金而形成的资本；（5）遗产资本（继承资本），即由父祖的遗产而变成的资本；（6）官僚资本，即官僚（包括宦官）所提供的资本；（7）劳动资本，即白手起家，专恃自己劳动所得，积累而成的资本。^①

叶显恩对徽州佃仆制与徽商的关系相当关注，他认为佃仆交纳的土特产和佃仆在商品运输上提供的劳役，是徽州商业资本形成中的一个重要来源。不少徽商是地主出身，役使佃仆从事山场的开发和管养，贩运杉木，甚至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从佃仆身上的剥削所得，是徽商资本形成的重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徽州的商人地主在对佃仆进行经济剥削的同时，顽固坚持保留主人与佃仆之间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②

王廷元对叶显恩的上述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徽州大贾出自缙绅之门者并不多见，这种商人当然可以把他们的封建剥削收入转化为商业资本，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佃仆劳动。但如果把徽商资本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那就未必符合实际了。据考察，徽商中出自地主缙绅之门者只是少数人，而出身于贫下之家者则占绝大多数，后者都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出外经商的小商小贩，他们虽然资本无多，但却能以小本起家，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发财致富。徽州的豪商巨贾往往出自他们之中。就这些商人而论，他们资本的来源和积累都是与佃仆制度没有关系的。^③

（三）徽商的经营行业

徽商无货不居，以盐、茶、典、木为最大宗，兼营粮、棉、丝、绸、墨等。对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学者都有论述。

1. 盐商

盐商是徽商的中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故论述徽州盐商的文章最多，徽

①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200页。

②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和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116页。

③ 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州盐商与两淮盐业的关系更是徽商研究中的重点。

刘森探讨了徽州盐商的经营特点,认为明末实行纲运制以后,以徽州盐商为主体的明代内商,完全成为受封建朝廷庇护的盐商垄断集团;在清代,徽州盐商已成为专营盐货的盐业资本集团,其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加细密。在两淮总商中,徽人所占比例最大,实力亦最强,从而使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①

张海鹏认为从元末明初开始,徽商便陆续到达两淮经营盐业^②。明清时期,徽商联袂而来两淮有两次:第一次是明中叶,即叶淇变盐法和李汝华、袁世振实行纲运制以后。到了明末清初,由于矿监、税使以及战争动乱,两淮盐业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衰败时期,盐商纷纷“撤业”。康乾时期,由于清政府实行一系列“恤商裕课”政策,徽商第二次云集两淮。徽州盐商在明清三百多年中之所以能在两淮扎根,并后来居上,在于地缘优势、文化优势、政治优势和宗族优势。^③

王振忠利用收集到的大量未刊资料,对明代中后期盐政制度的嬗变作了考证,认为从“势要占窝”演化为“盐商占窝”,是徽商大规模输献的结果。他对清代前期徽商在两淮地区的“月折”制度做了详细分析,指出清代前期徽州盐商组织与徽州的家族制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徽商以侨寓地为中心,逐渐土著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淮扬地区的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④

范金民则认为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两淮,基本原因难以归于实行并不长久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归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叶淇和袁世振的变法只是为各地域商人发展实力提供了契机,而为迎接这种契机做好准备则是凭籍长期的运作。明代开中法由正常到败坏,救编补弊而维持,终未废止,有利于作为内商的徽州盐商的活动,而不利于作为边商的山陕盐商的活动。^⑤

2. 茶商

茶业在明清时期是徽商经营的第二大行业,近代更成为最大的行业,对茶商的研究在数量上虽不如盐商,但质量仍然是很高的。

唐力行分析了徽州茶商的活动地区,除本府辖区外,还有苏州、湖北、湖南、四川、上海、江西、北京、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区,甚至还有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茶商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胜,主要在于读书明理,精于筹算;以义为

① 刘森:《徽州盐商的经营特点》,《徽学》1986年第1期。

② 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152页。

③ 张海鹏:《徽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明清徽商与两淮盐业”研究之一》,《货殖》第2辑。

④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⑤ 范金民:《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利,财源不竭;审时度势,灵活经商;富而张儒,仕而护贾。^①

周晓光具体论述了清代徽州茶商的情况,指出清代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经历了兴盛、低谷、中兴和衰落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经营方式一体化、经营活动季节化、兼营现象普遍、资本组合多样性等突出的特点。光绪中叶以后,因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国际上洋茶的冲击及徽商本身在非经营性消费方面投入过多等因素,徽州茶叶贸易最终走向衰落。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②

3. 典商

徽州典商历史悠久,明清时期更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是徽商经营的主业之一,学术界对徽州典商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特点研究是比较多的。

王廷元分析了徽州典商发展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货币。明清时期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大了白银支付手段的功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市场,用钱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③

王世华则分析了徽州典商的特点:一是从商人数众,其中治典大多为休宁人,并且出现不少典业世家;二是典铺分布广,“几遍郡国”;三是典业规模大;四是典商兼业多,一般是兼营盐业、茶业、布绸业乃至存款业务。他还指出徽州典商迅速发展乃是因为:一是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二是世代相传,专业易精;三是讲求商业道德。^④

汪崇笈认为不能把“典当利率”误认为“典当资本利率”,不能把“典当资本利率”误认为“最高资本利率”,不能以现代“低利贷”为由贬斥古代“高利贷”。经过对文书资料的分析,徽州典当业的实际资本利率并不高,在徽商经营的诸多行业也不是最高的,徽州典当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量增加后的必然产物,符合社会需要,长期以来关于徽州典商“高利贷”的指责是不正确的。^⑤

4. 木商

徽州是江南重要的木材产地。宋代徽州木商就很活跃,明清时期其活动范围

① 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169页。

② 周晓光:《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③ 王廷元:《徽州典商述论》,《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

④ 王世华:《明清徽州典商的盛衰》,《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⑤ 汪崇笈:《徽州典当业研究中三个可能的误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更扩大到全国,成为徽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唐力行具体分析了徽州木商的经营环节,特别是依据清宣统年间的杭州木商公所征信录,对会馆公所在处理木商经营中面临的问题、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①

何建木依据实地调查和谱牒资料,对婺源思口镇西冲俞氏木商家族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追溯,指出这个家族在从乾隆初直至民国末的长达200年间经营木业,由于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不断把握商机并进行适时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成功之余,大兴土木,报本思源,留下了大量的祠堂和民居,成为村落社会发展的原动力。^②

5. 海商

徽州海商曾是徽商中的重要一员,但因牵涉到明代倭寇问题,使研究工作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争论最大的是关于明代的徽州海商和王直、许栋等徽州籍倭寇的关系,各种观点之间分歧巨大,对若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大相径庭,这里既涉及对同一史实的不同解读,又涉及不同的评价标准。

聂德宁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徽州海商往来于东西二洋,称雄东南沿海,先后出现过许栋、王直、徐海等名噪一时的巨商大贾,他们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并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猛烈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转变,无疑有其进步意义。^③

唐力行认为,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并不限于海上,而是包含有三个层次:其核心层次是直接雄居于海上的徽商,以王直为代表;其外围层次则是由广泛分布于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手工作坊主构成;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中介层次是徽州行商。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一个海外贸易的整体,其经营方式是合资经营或集团经营,他们组成武装集团占据海岛或自行到大陆采购货物。^④

郑力民则认为,以王直为首的一股徽商武装走私力量首先发难,一手制造了嘉靖海乱,是徽商在其自身发展中由于资本的急剧膨胀而不甘忍受海禁政策的束缚才挑起的。这在客观上有进步性,但这种进步十分有限。因为徽商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王直一伙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海禁取消派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丝毫不包含有任何为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生长而要求建立海外市场的积极因素。另外,海乱使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内陆广大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危害,在实际上也给

① 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186页。

② 何建木:《徽州木商世家——婺源西冲俞氏》,《寻根》2005年第6期。

③ 聂德宁:《试论明代中叶徽州海商的兴衰》,《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

④ 唐力行:《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予以毁灭性打击。所以徽商的封建性与战争的破坏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起到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同时，他们勾倭乱华，引狼入室，也是应受到谴责的。^①

王世华认为，在嘉靖倭寇侵扰之际，徽商不但没有通倭，反而采取各种形式加入到抗倭斗争的行列，一是捐资筑城，募勇抗倭；二是出谋划策，领导抗倭；三是弃贾从戎，杀敌疆场。嘉靖倭寇不是在搞海外贸易，更不是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首先，倭寇大量掠夺社会财富，严重破坏商品生产。其次，倭寇也掠夺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破坏商品流通。因此，倭寇恰恰阻碍与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至今还未发现一条材料证明倭寇把掠夺到的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或把掳掠到的人口变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嘉靖倭寇的活动与资本原始积累也是风马牛不相及。^②

（四）徽商的经营理念和商业道德

1. 经营理念

张海鹏认为徽商是一支儒商，文化品位较高，是其他商帮难以比拟的。徽商之所以被称为“徽骆驼”，这与他们受儒家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徽商的经营理念，主要有效益观念、质量观念、名牌观念、信誉观念、法律观念、途程观念。这些大多与经商的道德观念密切相关。徽商的社交文化是“立体”的，即上自天子，下至村夫，都与之相交；同时，又是“全方位”的，即与士农工贾均相与往还。^③

龙达云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商帮之所以能在全中国商界独领风骚数百年，其经营之道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徽商的经营之道可以概括为薄利竞争、以义取利、注重质量、提高信誉，造就徽商此种经营之道的一是来源于历史经验，一是得益于实践经验。^④

2. 商业道德

王世华认为，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他还分析了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是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贾而好儒”使徽商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其他商帮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包括商业伦理道德的思想资料；“贾而好儒”又使徽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⑤

① 郑力民：《徽商与嘉靖海乱——兼与戴裔煊先生商榷嘉靖海乱性质》，《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② 王世华：《论徽商的抗倭斗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③ 张海鹏：《论徽商经营文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④ 龙达云：《浅谈徽商的经营之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⑤ 王世华：《论徽商的商业道德》，《光明日报》1998年2月13日。

洪璞探索了中国古代儒家经济伦理对明清时期徽商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重群体抑个体的道德原则和重义轻利的道德规范是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上述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徽商的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徽商所奉行的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利他而抑利己、重礼让而抑竞争、重平均而抑分化的原则,以及取予有度、财用有制、交往有信、刻苦顽强等规范,便是很好的说明。这些原则和规范对徽商的事业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和兴盛;另一方面,它又阻滞了徽商挣脱封建羁绊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化。^①

王廷元指出,徽商的经营之道和商业道德,无不受到儒家义利观的支配。徽商崇尚儒家义利观,主要表现在经商是为了义,而不是为了利;注重商业道德,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促进了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但这种义利观不利于徽商的资本积累及其向产业投资,使得商业利润封建化;同时也使得徽商始终只是封建政治势力的附庸,而不能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力量。^②

(五) 徽商与文化教育

张海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徽商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形象概括了徽商与文化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徽商通过兴修书院、出版书籍、提供资助,为新安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徽商通过经济上的扶持尤其是赞助出版医学著作对新安医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徽派建筑的形成也离不开徽商,因为商人们在“资大丰裕”后,出于种种原因不惜拿出巨资,建造各种建筑物,相因既久,遂成风格。由于徽商收藏字画热的出现,又刺激了新安画派的蓬勃发展。徽州文化的各个领域是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地文化的结晶,是对外地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这同样也离不开徽商的功劳。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因素很多,而徽商的“酵母”作用,则是十分重要和最基本的。^③

李琳琦探讨了明清徽商与儒学教育的关系。他指出,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凭籍财力优势,殚精竭虑,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徽商对儒学教育情有独钟,是有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多方面的原因的。徽商“振兴文教”,收到了人才辈出之效,不仅产生了一大批进士、举人和官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徽州文化”。对徽商商业本身的发展也是有益的。^④

宗韵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商是善于教子的古代商人群体,在采用耳提面命和尺

① 洪璞:《儒家经济伦理与徽商》,《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② 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3期。

③ 张海鹏:《徽商与徽州文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

④ 李琳琦:《明清徽商与儒学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牍传教两种方式对子弟进行“言教”的同时，又极其注重“正身率下”，注意言教和身教有机结合，律己和教子良性互动，既突出言传的艺术性，又讲究身教的规范性。商业教育是徽商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将子弟缔造成激烈商战中应付裕如的商人，徽商着重从知识、素质、技能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展开全面的职业培训，以期为其很快适应市场和占有市场提供保证，形成了中国古代鲜为人知的经商家传，对现代商业教育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①

（六）徽商的性质和作用

徽商的性质和作用的研究重点之一，它与中国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有何关系？是封建主义的气息重，还是资本主义的色彩浓？以上问题长期成为学术争鸣的焦点。

傅衣凌先生认为徽商资本在分解封建社会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具有不少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但又被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非常明白地反映出商业没有出路的窘态，且相反地，成为封建势力的附庸，转被封建势力所统驭，成为维护乡村公社残存物的一个工具。^②

藤井宏则将徽商定义为“集中地体现着以旧中国社会的物质为背景的最典型的前期的商人”^③。徽商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在整个中国扩大其商业圈，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似的陆续开拓了新市场，满足新的需要，促使农民力量行于结集，徽商与封建国家的紧密结合，一方面加强了对农民大众的榨取，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自己的掘墓人，“在旧中国充满着最反动意识的新安商人，在推进中国历史前进中，起着重大作用”^④，对这个作用不宜评价过低。

叶显恩指出，徽商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是徽州商人造成大量货币资本在个人手里积聚，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创造了历史前提，有的徽商已开始把部分资本投入手工业生产；二是徽商所进行的远距离的商品贩运，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起了促进作用；三是徽商对各地区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但就徽商本身而言，虽然已有少量资本开始与生产相结合，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可能，但是徽商同时又身兼地主、官僚，形成三位一体，具有明显的封建特征，而且，总的说来，他们是服务于封建制度的，从其利润的封建化就可说明这一点，而如典商一类的高利

① 宗韵：《明清徽商家庭商业教育述略》，《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

②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③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④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